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协同创新中心智库丛书

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全球经济治理”系列



Xinxing Daguo Guanxi yu
Quanqiu Zhili

新型大国关系与全球治理

第四届国际政治经济学论坛论文集

隋广军 李青 主编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协同创新中心智库丛书

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全球经济治理”系列



Xinxing Daguo Guanxi yu
Quanqiu Zhili

新型大国关系与全球治理

第四届国际政治经济学论坛论文集

隋广军 李青 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新型大国关系与全球治理：第四届国际政治经济学论坛论文集/
隋广军，李青主编.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7. 12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协同创新中心智库丛书·广东国际
战略研究院“全球经济治理”系列)

ISBN 978 - 7 - 5141 - 6551 - 7

I. ①新… II. ①隋… ②李… III. ①政治经济学 - 文集
②国际关系 - 文集 IV. ①F0 - 53 ②D80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16035 号

责任编辑：王冬玲 张 燕

责任校对：徐领柱

责任印制：邱 天

新型大国关系与全球治理

——第四届国际政治经济学论坛论文集

主编 隋广军 李 青

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社址：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甲 28 号 邮编：100142

总编部电话：010 - 88191217 发行部电话：010 - 88191522

网址：www. esp. com. cn

电子邮件：esp@ esp. com. cn

天猫网店：经济科学出版社旗舰店

网址：http://jjkxcbs. tmall. com

固安华明印业有限公司印装

710 × 1000 16 开 18 印张 350000 字

2017 年 12 月第 1 版 201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141 - 6551 - 7 定价：55.00 元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电话：010 - 88191510)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 - 88191586)

电子邮箱：dbts@ esp. com. cn)

编委会名单

编委会成员（按姓氏拼音顺序排名）：

主	任	隋广军	张宇燕		
成	员	陈寒溪	陈伟光	冯维江	何传添
		李青	刘继森	谭秀英	王海
		肖鹤飞	周方银		

前

言

进入 21 世纪，中美关系如何冲出“修昔底德陷阱”，避免大国对抗与零和博弈的历史覆辙，成为世界各国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重点关注并深入研究的问题。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实现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大国合作，既是中国对未来大国关系的一种思考，也是中国对解决目前国际关系冲突的一种对策。

2011 年 1 月，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访美期间，中美两国元首就建立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达成共识。在接下来的中美高层交往中，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轮廓逐渐清晰。2012 年 5 月，在北京召开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期间，双方将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作为对话主题，使这个概念越来越引人注目。2013 年 6 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时任总统奥巴马在美国加州安纳伯格庄园举行了会晤，就中美关系未来发展达成了重要共识，同意共同努力建立以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为核心特征的新型大国关系。

然而，随着中国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国际地位不断提升，美国对中国未来发展一直存在质疑，对中国采取“两面下注”的政策。美国实施“重返亚太”的战略，使亚太地区的安全问题变得尖锐起来，引发了以海军技术为核心的地区军备竞赛，东亚国际关系变得更加复杂。在这种形势下，建设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就需要创新思维。在新的条件下，如何处理中美关系，如何处理亚洲各国的关系、如何在全球治理问题上形成密切合作，都是摆在学者和政治家们面前的全新课题。如果中美两国不能率先垂范，建立起新型大国关系，那么在全球范围内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就无从谈起。

21 世纪，人类面临诸多公共问题，如人口膨胀、资源短缺、粮食危

机、环境恶化、毒品走私、跨国犯罪，等等。以美国霸权为基础的全球治理机制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随着美国实力相对衰落、新兴大国不断崛起，现有的全球治理机制越来越难以应对新的问题，这种现实将迫使世界各国携手共进，推动制度改革与创新，走向全球治理的新阶段。

推动全球治理机制改革是政治家的政治责任，也是专家学者的学术使命。2013年10月19~20日，以“新型大国关系与全球治理”为主题，第四届国际政治经济学论坛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召开，参会学者提交了40余篇学术论文，集中讨论如何以建设新型大国关系为基础，推进更为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这些富有现实意义的理论探讨，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我们从中挑选了最具有代表性的17篇论文，结集出版，供大家参考和交流。

这次国际政治经济学论坛的成功召开，以及本书的顺利出版，得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张宇燕所长的鼎力支持，谨此向他致以真诚的谢意。在会议筹办过程中，我们还得到《国际安全研究》杂志编辑部谭秀英主编的热情指导，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的同事和老师们的关心与帮助，以及在繁忙之中参加第四届国际政治经济学论坛的专家学者的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表示诚挚的谢意。本次会议还得到了教育部创新团队项目“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机制与战略选择”的支持，同时，感谢经济科学出版社的编辑们以及其他业内人士为本书的出版所付出的辛勤劳动。

隋广军

2017年10月

新型大国关系与全球治理结构

新型大国关系与全球治理结构研究	陈伟光 曾楚宏	3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与全球经济治理	林乐芬 祝楠	19
国际体系的均衡规范场理论研究 ——兼论 21 世纪新型大国关系的结构、维持与转换	李子江	39
现阶段美国霸权地位评估及新兴大国的应对战略	李晓 李俊久	85
新型大国关系与全球资源治理：以动态资源关系理论为视角	王海滨	122
超越旧模式：试论新型大国关系的若干基础	肖刚	130

全球治理背景下的国际战略

当前国际经济形势与中美经济关系	董小麟	151
全球经济治理框架的转型与重构	傅瑜 申明浩 杨永聪	161
市场失灵、机制设计与全球能源关系治理	徐斌	175
网络空间与全球金融治理	羌建新	195
文化外交构建国际形象中的跨文化传播问题探析	刘青	201
浅析美国梦的内涵、演变与启示	季宇绮	212

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举措

从小国政治到大国政治：中国在东亚地区的战略选择	陈寒溪	223
中国的产业结构调整与全球经济失衡治理	李青 黄亮雄	231
基于中国参与的全球治理新机制研究	何琼隽	251
国际货币权力与中国的应对	林宏宇	265
制度质量、制度距离与中国文化创意产品出口	许陈生 游芬	271

新型大国关系与全球治理结构

新型大国关系与全球治理结构研究^①

陈伟光 曾楚宏

一、引言

一定意义上讲，一部国际关系史就是一部大国交往互动、兴衰演变的历史。大国关系作为国际关系格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理论源自于大国在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互动中的实践经验提炼。一般而言，大国关系是指一个国际体系内主要大国之间的关系状态，以及这种关系运行的内在机理，所依据的主要规则和遵循的基本规范。大国关系决定了国际体系的基本特性，关乎着国际体系的总体稳定（陈玉刚，2012）。

大国之间的互动关系，既可能表现为伙伴合作的非零和博弈方式，也有可能表现为对立或战争的零和博弈方式。但是历史上并没有给大国关系管理带来完整的经验，近现代大国关系的演进，往往体现为新兴和守成力量的冲突和战争，并体现霸权更替的“领导长周期”的特征。所以，大国关系的根源体现为新兴大国和传统大国的关系，但从更一般意义上考察，大国关系包含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崛起中的大国代表中国与目前最强大的传统大国美国之间的关系，中国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的基本要义在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这是国际体系中的关键要素；第二层次是从中美双边关系扩大到新兴大国和

^① 基金项目：教育部创新团队发展计划“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机制与战略选择”（序号：IRT1224）。

传统大国的关系，这既是一些国家政府首脑对大国关系范围的认知，也是理论界比较认可的学术界定；第三层次是宏观层次，即大国体系内各国之间的双边特别是多边关系，主要体现为新兴大国和传统大国以及新兴大国之间、传统大国之间的关系。在当前世界多极化和“一超多强”的国际体系格局下，从这三个层次考察大国关系可能更加具有可靠性和完整性。大国关系管理的关键在于，如何从大国关系的历史悲剧所带来的认知阴影中摆脱出来，避免重蹈大国战争的覆辙，在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为原则下，开辟一条“前无古人、后启来者的新型大国关系之路”。

客观上讲，经历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国际体系中一些由来已久的问题更加凸显，一方面，后冷战时期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导致全球性的公共问题日益严峻，金融危机更加暴露了全球系统性风险的治理机制的严重缺陷，“全球治理失灵”使得全球治理机制改革从呼声转为行动，日益多极化的世界推动全球治理结构的转型；另一方面，全球化加速发展时期，也是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大国群体性崛起的时期，特别是在后危机时代，以美国为代表的传统西方大国的相对衰落，使得东西方大国的实力相对变化显得更为突出，特别是近期，全球增长差别、货币政策的分化等对不同经济体形成不同的风险（课题组，2013），大国关系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增加，迫切需要发展新型的大国关系，以构建一个稳定的国际新秩序。

冷战结束期间，全球治理的课题逐步走向理论研究的视野，但早期的全球治理理论要义是强调非国家行为体自发机制在治理中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金融危机之后，具有理想化色彩的全球治理理论讨论转变为更加强调国家为主体的多边共治的集体行动，更加强调体现新兴大国代表性的全球治理机制改革，更加强调治理的有效性和合法性的统一。所以某种意义上，现在的全球治理基本构成对新型大国关系的尝试性规定，新型大国关系是当前“世界无政府状态”下的全球治理的关键。如何处理好大国关系的管理与全球治理转型的互动关系，是当前国际政治和经济领域内具有挑战性的重要课题。

二、新型大国关系与全球治理的领导

在早期的全球治理的主流理论中，虽然不否定主权国家在众多行为体中的主要作用，但很少涉及全球治理的国际领导及其权力问题的讨论，因为发

端于冷战结束后美国处在“单极时刻”背景下的全球治理理论，其要义是强调全球化进程中，当市场调节和政府治理缺失或失灵时非国家行为体自发机制在治理中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也就是说，早期的全球治理理论实际上是隐含着“美国治下”或“美国领导下的”打上新自由主义烙印的全球治理，推行西方普世价值、去政治化和淡化国家主权的意识较为明显，同时也透露出西方制度的优越性及其在不发达国家治理中的有效性（吴兴唐，2007）。同时，全球治理理论对权力分析的忽视是对现实主义过于注重权力对国际关系的决定意义进行批评的结果（许琳、陈迎，2013），随着全球治理的兴起，主权国家外的各种治理主体在与主权国家深度互动中拥有了治理权力，权力的分化现象使得全球治理的理论疏于考察权力与治理机制的关系以及权力的作用等重大问题（Hurrell，2005）。

当然，在全球治理中，非国家行为体的地位今后是否会相对提升并超越国家行为体并成为主角，还需要理论的探索 and 历史的检验，但现实中的这两类行为体权力的非对称性，在经历全球金融危机后，表现得更为突出，国家、国家集团和政府间国际组织在国际体系的治理中的作用得到了强化，国家中心主义的治理得到了某种程度的回归。

金融危机、主权债务危机、中东乱局以及全球气候谈判和贸易谈判困局等一系列全球性问题的出现，充分反映了全球治理系统存在效率低下或效率缺失，全球治理的困境使人们反思全球治理结构转型问题。那么，何种全球治理结构才是相对有效率的？

全球治理强调是对全球化市场失灵的一种协调和管理，其效率反映的是解决全球性问题特别是全球化负面效应的能力和效果，更多地体现参与者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意愿、能力及其这种集体行动的管理效率。在目前多边进程下的全球治理中，其效率存在与否的关键在于国际领导，也就是说，没有领导的多边治理，往往是无效的多边治理（庞中英，2010）。

什么是国际领导？关于国际领导的研究，散见于一些国际关系学的学术文献。应该说，国际领导是国际人格化的一种研究话语模式，在国家为基本单元组成的国际体系中，国际领导并非由特定的机制，比如通过选举方式而产生的，而主要是在国际社会互动中博弈的结果。能够称得上国际领导的国家，首先是由长期稳定的综合国力决定的，大国尤其是具有强大的军事、经济实力的超级大国，具备国际领导身份的先决条件。因为这样的大国，具备转化多种形式的权力的基础，即凭借资源优势控制他人的强制性权力（Com-

pulsory power)、通过规则控制他人的制度性权力 (institutional power)、定义他人认知和能力的结构性权力 (structural power) 以及通过系统知识和话语系统控制他人的生产性权力 (productive power)。

但是客观上具备实力和权力优势的国家不等于就是国际领导, 国际领导还必须具备第二个条件, 即承担大国责任的领导意愿。领导意愿反映的是运用权力的状态, 即积极的权力和消极的权力。从大国关系史上看, 客观上的国际领导实力和主观上的国际领导意愿有时并不是同步实现的, 或者说存在治理权力强大时却消极使用的情况。19 世纪末, 快速崛起的美国在经济上已经超越了“日不落帝国”的英国,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军事实力也至少已经同英国相当, 但经过大萧条时期的美国, “孤立主义”阻碍了其积极承担起全球责任, 缺乏担当国际领导的意愿。随着 1941 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 美国正式开启了从英国承接世界领导者角色的进程。如果历史可以假设的话, 美国在 20 世纪之初就愿意更多地承担国际责任, 而英国延长提供领导力的时间, 两次世界大战或许可以避免 (张云, 2012)。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 美国开始真正充当全球治理的主要领导, 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等重要的国际机制都是在美国的主导下建立和运行的,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所没有的相对广泛的多边机制, 美国通过这些机制承担和协调了货币稳定以及自由贸易的相当多数的全球公共产品, 应当承认它们在过去的几十年里, 为维护世界和平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证。

冷战终结后, 美国作为唯一的一个超级大国处于绝对的霸权地位, 具备了充分的国际领导实力。特别是在“9·11”之后的小布什时代, 美国改变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处理全球事务的多边主义架构, 理直气壮地走向了实力政治、强调对抗和单边主义 (李少军, 2003)。这一时期的美国的霸权地位和霸权行为更加突出和强化了。但是霸权不等于领导, 冷战结束后的美国霸权, 利用唯一的超强地位极力维护、谋求和实现自身的国家利益, 这种利己的单边主义是“孤立主义”变种, 恰恰表现出对多边主义领导角色的排斥。比如, 在“9·11”以前, 布什政府宣布退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京都议定书》, 拒签《全面禁止核武器试验条约》(CTBT)。“9·11”之后, 布什政府又采取了退出反导条约, 不支持禁止生物武器公约, 拒签地雷公约等行动。美国的这些做法, 不但没有对全球治理发挥规范、协调作用, 反而为一些国际合作机制设置重重障碍, 这是典型的消极权力应用的做法。

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国际领导的能力和意愿呈现双双下降的态势，一方面，经历了两场反恐战争的拖累和深受金融危机的重创，美国面临着能力困境；另一方面，美国开始调整其全球战略，收缩其战略范围并将重心转移到东亚，实施再平衡战略，美国的“孤立主义”进一步抬头。更为关键的是，中国等发展中大国群体性崛起使得中西方力量的对比发生了变化，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领导的格局受到了挑战，在西方世界整体下滑、新兴大国“将起未起”的情况下，为了弥补国际关系格局在未来一段时期内将可能出现一定程度上的“权力真空”（金灿荣、段皓文，2013），逐步形成了以中西方大国集体领导的格局。

现实中的多边主义集体领导体现在以下三个层次：

一是全球层面，通过一定的多边机制形成的国际集体领导。除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传统的国际领导集体以外，G20 构成了国际集体领导重要的互动和交流平台。从结构上，G20 涵盖了所有国际公认传统大国和新兴大国，集中了地理意义上的和政治经济意义上的大国，相对 G7 西方国家“富国俱乐部”而言，G20 反映了不同类型大国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尽管这种结构在权力结果上并没有充分反映东西方力量对比的变化；数量上，尽管一些重要的国家，比如新加坡提出了加入 G20 的诉求，G20 合法性也遭受到学术界和政界的质疑。但是 G20 作为大国互动的重要多边国际机制，自东南亚金融危机后建立以来，特别是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的 G20 峰会，取代 G7 成为全球经济治理最重要的平台，从整体上说，G20 在协商处理全球经济事务上发挥了国际集体领导的作用，随着 G20 的日趋成熟，在治理对象上 G20 将逐步超越经济领域，开始在国际安全、国际能源等领域内发挥国际领导集体的作用。

二是在区域和特定领域层面上，一些大国或国家集团形成第二层次的国际集体领导。如在气候治理上，美国作为人均碳排放居全球第一和拥有一流减排技术的国家，不但没有运用其先天的国际领导实力担当起气候谈判的领导责任，而且以经济成本过高等理由最早退出《京都协定书》，回避减排义务。与此相对照的是，欧盟在国际气候进程中，体现了领导实力和领导意愿，不仅在减排技术提供和碳交易标准上做出了全球领先的成效，而且成功地将气候变化议题纳入国际议程，并使温室气体的控制标准达成了全球共识，欧盟在全球气候治理上扮演了主要的领导角色，一定程度上保持着“领头羊”的地位（许琳、陈迎，2013）。

三是国际集体领导核心。国际集体领导的核心问题也是大国关系的核心

问题，一定意义上，中美新型的大国关系已经超越两国的双边关系，而决定了今后国际体系权力核心和领导责任格局。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是中国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的起始点和关键点，近年来，中美两国高层频繁交流互动，达成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基本共识，为新型大国关系的理论构建确立了方向和基础。从内容上分析，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主要体现三个方面：

其一，避免大国对抗甚至交战的历史悲剧。“不对抗，不冲突”是大国关系“新型”的关键要义和基本条件，也是全球治理进程中不可或缺的国际环境。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是在中国快速崛起和中美差距缩小，两国战略互疑态势明显、结构性矛盾增强的背景中提出的。中美关系未来的基调是紧张还是缓和不仅关系这两个“相互确保经济摧毁”的国家未来发展，更会因这两国于世界政治与经济舞台上的无上地位而左右未来整个国际格局的和平与冲突（金灿荣、段皓文，2013）。国际关系的历史上，还没有新旧大国长期和睦相处的先例。从16世纪的葡萄牙与西班牙、西班牙与荷兰，到17世纪的荷兰与英国、荷兰与法国，再到18~19世纪的英国与法国，其特征表现为“对立与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苏美冷战，表现为非直接热战的“对抗与竞争”，前者是因经济利益冲突白热化所致，后者是缘于政治立场水火不容（徐坚，2013）。和以往的“革命性”国际体系下的大国关系不同，现今是“稳定性”国际体系下的新型大国关系，其特征表现为“竞争与合作”（李文，2013）。中美两国在经济政治安全等各个领域都存在避免大的冲突的客观条件，两国需要消除各种认识误区，从而增强战略互信，减少和化解非理性战略焦虑。塑造新旧大国和平共处的主观努力和客观条件，决定了突破大国争霸的历史宿命可以避免，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将为塑造国际新秩序和全球治理提供正外部性。

其二，建设两国的伙伴合作关系。伙伴关系是全球治理的行为体关系的一种理念塑造和身份定位，伙伴关系既不是现实主义世界的敌对关系，也有别于自由主义描述的完全以利益导向的合作或是竞争的利益攸关方。它是一种基于信任和认同的关系，强调利益和价值的互补性（秦亚青，2013）。事实上在中国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的理念之前，对于大国关系的管理，奥巴马政府对布什的单边主义做出修正，承认“即使美国也不能单独行动”，需要塑造“全球伙伴关系（global partnership）”。实际上，中美的伙伴合作关系是美国提出的“全球伙伴关系”的主体内容，也是中国提出的中美新型的大国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特征是体现对以往的新型大国和守成大国关系的超

越。现今的中美关系是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础上的竞争与合作的关系，中美经济互补性、相互依存度以及良性竞争格局，在以往新老大国关系史上是不曾有过的，中美两国彼此互为第一或第二大贸易伙伴，中国出口导向朝内需拉动的经济转型，可能成为美国最大的海外市场。中美两国之间的良性经济互动，将为全球经济失衡的矫正起关键性的作用，这与冷战期间中美关系建立在共同安全的基础上的情况有本质的不同。

其三，中美两个世界主要大国的权利和义务均衡，承担全球共治的领导责任，这是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高级形态。作为世界上两个重要大国，中美新型的大国关系除了在相互依存中维护彼此的核心利益开发共同利益外，还需要提供相应的国际公共产品的义务，共同应对诸多地区和全球性挑战，在塑造未来的国际体系中深化合作。2010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主张：“美国继续推进与中国积极的、建设性的和全面的联系，欢迎中国与美国一起承担负责任的领导角色”。作为融入国际体系的大国和全球化的受益者，尽管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扮演着负责任大国的角色，承担了应尽的国际责任，但要求中国承担更多的责任的呼声一直就没有停歇过。实际上中国承担更多责任的要求，其真实意义的背后是继美国之后承担更多的国际领导责任。因为无论是传统安全还是非传统安全，经济还是环境领域，今天的美国都缺乏“单独行动”的霸权代价和领导成本的能力和意愿。为了防止集体领导会有可能出现谁都不愿意负责任的不领导的结果，中国已经或着手准备做出相应的行动。例如准备介入美国撤军后的阿富汗问题、邀请叙利亚反对派访华等，这事实上是在为防止“领导力真空”做出的实质性尝试。但是，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发展中大国，存在所谓“二把手”的困惑，即如何在承担更多的大国责任的同时，维护本身的核心利益，发展自身的合法利益，保持权利和义务、责任和利益的均衡，这是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现实考量。

三、新型大国关系与全球治理的规范

在国际关系理论中，所谓规范是指“行为体持有的适当行为的共同预期”，这种集体期望和共同预期会在塑造行为体的行动方面产生影响，使其符合一定的规律，并有较高的可预见性。进一步地，规范具体化为“具有给定身份的行为体适当行为的准则”。实际上，规范、规则和制度是紧密相连不可